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题(一)

引文格式: 刘大禹, 张新宇. 从独立到联合: 中共早期处理国共关系的策略转变 [J]. 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2(2): 1-9.

从独立到联合: 中共早期处理国共关系的策略转变

刘大禹, 张新宇

摘要: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 坚持独立的政党立场。随着局势的发展与认知的变化, 同时受共产国际、国民党态度转变的影响, 到1924年国民党一大时, 中共全体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国共合作的实现, 并非中共对共产国际指示的全盘接受, 而是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 经过内部多次讨论与多方协商, 中共逐渐认识到国共合作的必要性, 其思想转变有一个渐进过程。中共早期处理国共关系的策略转变体现了早期领导人在实践中自身认知的不断提高, 为实现革命目标而做出的独立判断, 初步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实践, 为推动大革命的到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国共合作; 国民党

作者简介: 刘大禹, 历史学博士, 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张新宇, 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21.02.001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如何集聚革命力量, 实现党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 是摆在党的领导人面前的重要问题。很快, 中共从坚持独立的立场走向了与国民党深度联合的道路。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 学术界大多关注共产国际以及孙中山在推动国共合作过程中的作用。如向青认为马林“带来了以联合吴佩孚到联合孙中山的根本转变”^[1]。李志学认为“马林对孙中山的国民党的认识及态度在建立国共合作联合战线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是促成国共合作联合战线形成的前提条件”^[2]。无疑, 苏联与共产国际在推动国共合作的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是国共合作的发起者与推动者。然而, 中共作为国共合作的主体之一, 其策略变化并不是对共产国际指示的全盘接受, 甚至不无扞格, 具有一定的主观动机与独立判断, 完成了由被动接受命令到主动寻求合作的思想转变。本文试图对此做一探讨, 以助益理解中国共产党早期处理政党关系的复杂场景。

一、中共建党时坚持独立的政党立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西方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 无暇顾及中国, 暂时放松了对华经济侵略,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以迅速发展, 工人数量迅速上升, 成为一支新兴的社会力量。俄国

十月革命胜利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在五四运动的推动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共第一个纲领,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①

此时,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倡导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追求民族独立,赋予人民民主权利,主张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但三民主义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纲领,与共产主义在阶级性质与最终目标方面相去甚远。因此,中共坚持独立的政党立场,“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②。

中共初期这种坚持独立,不与其他党派发生联系的政治立场,折射出早期一些领导人缺乏斗争经验,无法划清社会主义革命与民主主义革命界限的局限性。1919年,李大钊曾提出:“我们为继续人类的历史,当然要起一个大变化。这个大变化,就是把从前诺亚以后的大洪水,把从前阶级斗争的世界洗得干干净净,洗出一个崭新光明的互助的世界来。”^③李大钊此言是基于革命者所具有的阶级性而试图实现人类历史的“大变化”,意指通过革命而实现消灭阶级的目的,换言之,凡与无产阶级立场不同的组织或团体,都有可能成为革命洗涤的对象。这样一种笼统的、宽泛的革命论点,在早期共产主义者中并不鲜见。其后,参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就是否应当支持孙中山革命的问题,曾展开过争论,“大多数代表主张中共应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对于现实政治问题,有的主张中共目前不应参加实际政治活动;有的表示中共应站在共产主义的立场上,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予以支持”^{[3]139}。争议焦点就是革命运动究竟是以我为主,还是可以与其他政党尤其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多数意见是,中共对待其他党派表现为一种“关门主义”,对于如何壮大党的组织力量以实现革命纲领,尚缺乏明确清晰的蓝图。

然而,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所有共产党员加起来不过58人,多是知识分子和迫切希望救亡图存的热血青年,既无财力,也无官权。对于赤手空拳、力量弱小的中共来说,要想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未免异想天开。毛泽东晚年就认为中共一大前后的宣言和纲领是“空想”,他读到1920年11月形成的《宣言》文本时,直截了当地批了一句话,即:“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革命,是空想。”^[4]在这种组织力量极端弱小的情况下,改变原有排斥其他政党的策略,与已初具规模的国民党合作是最优选择,至于如何合作则可进一步探讨。

二、中共主张民主的联合阵线

中共坚持独立的政党立场,很快因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提议而发生了重大转变。然而,共产国际的指示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被中共接受,中共是受共产国际之命转变政党立场,还是基于自身认识的提高而采取务实策略,需予以分析。1919年3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1920年前后,先后派遣维经斯基(吴廷康)和马林来华开展东方民族解放运动,试图推进东方中国的革命。4

①②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1册 1921年至1925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页、第8页。

③参见李大钊:《阶级竞争与互助》,1919年7月6日,《每周评论》第29号,《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页。

月，维经斯基受命来华帮助组建中国共产党，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对于中国早期的革命问题，1920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认为“在社会党的立法和劳动者的国家未成立以前，资本阶级内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会上决不是毫无意义；所以吾党遇着资本阶级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后者胜利时，马上就是我们的敌人”^①。陈独秀提出中国革命要“两步走”，必须先经过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军阀的民主革命阶段，再进行社会革命。在第一步，应该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陈独秀并不排斥与代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国民党合作，但这种合作，是党派之间的平等合作，是帮助资产阶级民主派进行革命。到了第二步，才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划清界限，并与之决裂。

1921年6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指出各国的共产党应团结广大的无产阶级，同时争取更广泛的劳动群众，以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基于统一战线的会议精神，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桂林会晤了孙中山，双方进行了多次会谈，马林“极感满意”，“他认为孙中山先生可以和苏俄建立友好关系，国共两党也可以密切合作”^{[5]216-217}。随后，马林又进一步赴国民党的根据地广州进行访问。此时正值香港海员宣布大罢工，他目睹了罢工现状，评论道：“这次强有力的海员罢工和国民党的领导证明民族主义运动同工人阶级组织之间的联系已经建立。”^{[5]26}

马林将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基于革命力量联合之必要，意欲推动国共两党合作。与此同时，列宁会见了被派往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张国焘与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列宁一开始就向我们提出国共两党能否合作，显然是他所注意的一个关键问题”^{[3]199}。苏联与共产国际将中国视为打破帝国主义包围封锁的缺口，国共合作是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

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共对共产国际的提议态度如何。1922年年初，马林提议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在中共内部引起激烈讨论，陈独秀对以共产党员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予以强烈反对。陈独秀写信给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阐明了6条理由：“一是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二是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三是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的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机会。四是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五是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六是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无加入之可能。”^②由此可见，陈独秀虽不反对国共合作，但他坚决反对党内合作方式。陈独秀明了，中共党员如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谁主谁次，一目了然，中共就会失去领导革命的自主权力，违背独立的民主联合阵线主张。而对于共产国际和苏俄而言，推动远东革命形势发展的最有效方式，便是将弱小的共产党嫁接到已初步成熟的国民党身上。此时，中共尚未意识到共产国际提议的现实性与可行性，仅从理论层面出发，将国民党视为阶级的对立面加以排斥，国共合作之推进只是共产国际的一厢情愿。

1922年4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是促使陈独秀等中共早

①参见陈独秀：《国庆纪念底价值》，《新青年》第8卷第3号，1920年10月10日。

②参见《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1922年4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1989年，第31—32页。

期领导人思想转变的重要契机。共产国际代表达林与许多共产党员都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的一项重要议题就是对国民党的态度问题。达林在会议上指出“关于建立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中国资产阶级关心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改革的那一部分人的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的必要性”,认为“工人阶级应支持孙中山政府”。在与国民党合作的方式上,他强调:“我们谈的是指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加入国民党,但是要以保持政治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为条件。”“以张国焘为首的另外一些与会者反对统一战线”,“陈独秀动摇不定,但在长时间的讨论以后他认识到了统一战线的必要性”^{[6]90-91}。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实际上已经促成了中共早期领导人对国共合作的进一步思考,民主联合战线思想已初步萌芽。

经过此次大会的讨论,面对革命形势严峻的局面,同时在共产国际的大力推动下,陈独秀等人逐渐认识到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对国民党展现了一定的联合意愿。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由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民主政治未能成功,名为共和国,实际上仍由军阀掌握政权,这种半独立的封建国家,执政的军阀每每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这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也是人民深受痛苦的源泉”,认为“中国现有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提出“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①。张国焘带着这份文件面见在北京的李大钊,李大钊“毫不迟疑地表示同意”,认为“上海中央的这种主张是正确的且合时的”^{[3]233,247}。

从陈独秀和李大钊的立场转变可以观之,中共已初步转变了对国民党的政党策略。也正是在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上,中共决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其一个支部。显然,中共独立的政党立场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共产国际的强力干预,而中共内部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讨论与意见分歧,亦充分显示其独立判断的特点。经过多次讨论,中共内部多数领导人开始初步意识到国共合作是实现自身革命目标的必要环节,折射出中共早期领导人对中国革命运动与实现革命目标方式的认知不断提高。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明确提出,“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②。这种民主的联合阵线,“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③。不难看出,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中共基于自身对革命认知的提高与为实现革命目标的愿望,乃有主动联合国民党之意,但仅停留于“党外合作”方式,坚决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三、孙中山对国共合作的意图

对于国共两党合作,国民党领袖孙中山表现出了极大热情,实有吸收革命新鲜血液与壮大国

①参见《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1册 1921年至1925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3—37页。

②参见《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1册 1921年至1925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66页。

③参见《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1册 1921年至1925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65—66页。

民党力量之意图。国民党相较中共而言,革命实践经验更丰富,故孙中山认为国民党是唯一有能力进行国民革命的政党。“中国今日军阀与帝国主义勾结之现况,非国民革命,无由打破;而国民革命,惟本党负有历史的使命,非加入本党,无由为国民革命而尽力。”^{[7]408}在孙中山看来,中共可以加入国民革命阵营,而不能主导国民革命。对孙中山的意图,张国焘认为:“孙先生素来自视为中国革命唯一领袖,在他的革命旗帜下可以包容一切革命分子。他只要求人们拥护他的革命,并不十分注重其所信仰的革命主义究竟是什么……仿佛他代表革命的大圈子,应当将共产主义的革命小圈子,放在他那个大圈子里面,不可让它在外面。”^{[8]247}由是观之,虽然孙中山赞成中共加入由国民党主导的革命阵营,但无法否认孙中山具有一定程度的“防共”心理。

当马林向孙中山提出国共合作设想,并建议实行联俄政策时,孙中山并未加以重视。据马林对孙中山的判断,“华盛顿会议给中国造成不利局面,但是,只要他的北伐还未完成,联俄实际上是不可能的”^①。孙中山或出于对列强的忌惮,并未同意立即联合苏俄。然而,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后,局势很快发生了变化,孙中山由广东退回上海,迫切需要有新的革命动力。此时共产国际提议国共两党合作,当即得到了孙中山的赞成。虽然中共力量弱小,无人无财无权,但两党合作,对孙中山而言是摆脱困境的有利方式。孙中山若要进行北伐,需要有力的财政支持,苏俄和共产国际是其唯一的求助对象。长期以来,孙中山曾多次向英美等西方国家寻求援助,多次无果,心灰意冷,此刻苏俄恰好抛出橄榄枝,可谓正逢其时。孙中山在广州抵抗叛军之际,写信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直说苏俄“是我唯一的朋友”^{[6]126}。

实际上,在对中国革命联合对象的选择上,苏俄与共产国际一开始将吴佩孚、孙中山都作为联合目标。1922年7月,苏俄派遣越飞来华,希望促成孙中山和吴佩孚组建联合政府,然而孙中山、吴佩孚对其建议均不感兴趣。在中俄谈判中,吴佩孚与苏俄在中东路、外蒙古等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越飞在与吴佩孚的接触中深刻感受到:吴佩孚无论是在军事实力还是在政治策略上,都不是孙中山的对手。1923年1月,越飞写信给共产国际,提出:“如果我们不得不在吴佩孚与孙逸仙之间做出抉择的话,那么无疑我们要选择后者。”^②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产国际便把联合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孙中山身上。1923年1月26日,《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公开发表,标志着国民党与苏俄正式结盟。由于中共是共产国际的支部,联俄意味着联共。

当然,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的初衷,是为推进中国的革命事业。孙中山数度领导革命,多以失败告终,迫使其进行深度思考,即如何转变革命方式,壮大革命力量。俄国革命胜利的经验,看来有诸多值得借鉴之处。1918年孙中山在给契切林的信中写道:“我希望与您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织。”^③孙中山在与苏俄接触中,认识到共产党人在组织和宣传方面的高超本领,他需要借鉴俄共之经验,为己所用,“以视乎俄,瞠乎其后,则俄诚足为吾党借镜之资,而亦当引为吾国互

① 参见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73页。

② 参见《越飞给俄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信》(1923年1月1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196页。

③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53页。

助之友”^①。同样的,中共成立之初,同样显示出共产党人的革命性与战斗性,且为诸多国民党人所瞩目,如国民党元老张继在与马林的交谈中提到:“国民党已老朽了,需要增加新的血轮,所谓新血轮就是共产分子。”^②

基于多方考量,孙中山愿意联共,但他反对两党平行合作,坚决要求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在他看来,“让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受其约束,至少要比让中共置身于国民党之外,利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力量,与国民党竞争政治资源来得有利”^③。不过,孙中山也明白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虽有相似之处,但国共两党终非一党,具有诸多差异性,日后必会因革命目标和纲领不同发生矛盾。与其届时与共产党竞争,不若此时进行合作,同化共产党员,如此既壮大了国民党的队伍,又避免了两党斗争。

然而,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后,是否会出现“党内有党”的危险呢?对此,孙中山认为:“当国民革命时代,一心一德,惟本党之主义是从;其原有之共产主义,固不因之抛弃,而鉴于时势之关系,初步遽求其实现,故与本党主义亦无所冲突。”^{[7]408}“本党为代表国内各阶级之利益而奋斗;中国共产党则于各阶级中之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在国民中为大多数,……于本党之主义精神,无所违反。”^{[7]408-409}孙中山认为,共产主义虽与三民主义虽有不同,但目前革命任务一致,两者并不冲突;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国民党代表各个阶级的利益,涵盖了共产党所要代表的无产阶级,两党更应通力合作。

因此,为革命事业之考虑,孙中山决定联俄,并进而联共。孙中山意识到,与中共合作,或有丧失国民党独立性之危险。如何既能联合中共,得到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援助,又能壮大国民党力量,免受他人掣肘,孙中山在谈判中展现了他卓越的政治智慧。在《孙文越飞宣言》中,孙中山首要强调的是“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④。他坚定地要求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而绝不是两党平起平坐,把国共合作可能对国民党的负面影响降低到其掌控范围内。

四、国共党内合作的实现

面对孙中山国共党内合作的态度,同时受共产国际的相当影响,中共内部反对国共合作的声浪逐渐消解。中共二大后不久,1922年8月12日,马林从共产国际带回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在国民党内开展工作的指示,主持召开了西湖会议,重点讨论了国共合作的方式。

在会议讨论时,陈独秀反对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理由是“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政党性质的不同,会导致革命目标与方式不同,尤其是“一个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后,会引起许多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问题,其结果将有害于革命势力的团结”。李大

①参见孙中山:《致全党同志书》(1924年3月2日),《孙中山文集》(下册),孟庆鹏编,团结出版社1997年,第406页。

②参见《“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571—572页。

③参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年,第214页。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页。

④参见《孙文越飞宣言》(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文集》(上册),孟庆鹏编,团结出版社1997年,第343页。

钊“基本上是附和马林的”。李大钊支持党内合作方式，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李大钊认为“国民党的组织非常松懈”，“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同样不会受到约束”；二是李大钊清楚地知道孙中山不会同意共产党以与国民党平起平坐的方式进行国共合作，“采取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是实现联合战线的易于行通的办法”。经过马林的施压以及李大钊的耐心疏通，最终结果是通过了“中共的少数负责同志可以根据党的指示加入国民党为党员的决定”^{[3]243}。据包惠僧回忆，“虽然有不少的同志，对这一政策有不同意见，经过了中央的解释和说服，也就全党一致了”^[8]。

至此，中共内部主要领导人基本同意以国共党内合作方式与国民党联合，对于被国民党吸收同化，丧失独立性的危险，中共早已预见，并尽可能地把这种危险降低。陈独秀强调：“总之，我们共产党在任何问题的争斗中及与任何党派联合运动中，总要时刻显示我们的真面目于群众之前，更不可混乱了我们的独立组织与联合战线之中。”^①

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而实现国共党内合作，也有其自身之现实考量，绝非简单地帮助国民党进行革命，乃为凭借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争取与国民党合作，获得进一步壮大自身力量的机会。1923年2月7日，吴佩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工会代表和一些共产党员遭到残酷镇压。现实层面的重大打击使中共之前引以为傲的工人运动陷入低潮，中共真正意识到，仅仅依靠工人运动来抵抗军阀武力是不切实际的。作为工人运动的领袖，邓中夏说：“据经验告诉我，使我深深地相信，中国欲图革命之成功，在目前固应联合各阶级一致起来做国民革命”^[9]，中共与具有相当力量的国民党深度联合，是继续推进革命的一种有效策略。推进国共合作不再只是共产国际的强力干预，而转变为中共的自觉行动。

正如1923年6月中共三大针对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办法所指出的，“我们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更进而加入世界革命”，党的中心工作是“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②。实际上，中共对于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并不满意。“中国国民党辛亥革命以来十二年的奋斗一无所成，因为他完全和国民断绝关系，而只知道和军人政客交际。”^③面对国民党当时涣散无组织的状态，中共提出“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④。

为最大限度动员力量实现国民革命，中共三大做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根据马林的会议记录，在讨论中，毛泽东表示“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⑤。在后来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也指出：“不管被压迫民族中间参加革命的阶级、党派或个人，是何种的阶级、党派或个人，又不管他们意识着这一点与否，他们主观上了解了这一点与否，只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的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就成了无产阶级社

① 参见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目前的策略》（1922年11月），《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94页。

② 参见《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1册 1921年至1925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66页。

③ 参见张太雷：《羞见国民的中国国民党》（1923年6月13日），《向导》第29期。

④ 参见《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1923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1册 1921年至1925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47页。

⑤ 参见《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讨论》（1923年6月12日—20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236页。

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10]这里的“他们”显然包括有反帝要求的国民党。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标志着国共两党全面党内合作的实现,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当然,中共遇到的难题是如何避免自身被国民党吸收同化,在“积极联合”与“保持独立”两者之间达到微妙而准确的平衡。这种平衡在实践中受多方因素影响,后来中共在国民党内部蓬勃发展,引起了国民党人的警惕,两党进而分道扬镳。

五、结论

综上所述,中共成立初期,坚持独立的政党立场;后基于民主联合阵线之考虑,走向与国民党的深度合作,全体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种策略转变,除了因苏俄与共产国际的大力推动,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共成立之初自身力量过于弱小,组织队伍尚未发展成型。作为一个新生政党,为实现革命远大目标,中共在处理政党关系上做出审时度势的策略转变,表面看来是受到苏俄与共产国际的外在干预。实际上,无论是中共内部最初对共产国际相关意见的判断和讨论,还是与国民党深度联合决策的出台,都体现了中共早期领导人自身认知的不断提高;为实现革命目标而所做出的独立判断,初步体现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思想实践,积累了发展经验,为推动大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共与国民党的联合,为中共提供了发展良机。到1927年4月,中共党员人数达到5.7万人,发展可谓突飞猛进,为中共后来的革命提供了巨大支持。当然,中共早期领导人毕竟革命经验尚不丰富,关于如何实现宏伟的革命目标,不可避免会出现认知偏差。正是这样接连不断的现实考验让中国共产党迅速成长起来,这是一个新生革命政党走向成熟必然要经历的环节。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无论处于怎样复杂、严重、惨苦的环境,军事指导者首先需要的是独立自主地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①实际上,在中共的发展历程中,独立自主原则并不限于用于军事,而是体现在各个领域,且在中共早期就已初见端倪。纵观中共百年历程,独立自主是促使中共不断进步、不断发展、不断成长的力量源泉。中共在处理政党关系时,始终坚持以维护民族利益为己任,独立自主地做出科学判断,不断增强应对各种艰难险阻的能力,不断提高判断国内外发展大局的水平,使政党的初心使命与国家发展前途实现完美结合,从而领导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与人民幸福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 [1] 向青.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历史概述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3: 24-25.
- [2] 李志学.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问题的再认识 [J]. 学习与探索, 2004 (3): 124-126.
- [3] 张国焘. 我的回忆: 第1册 [M]. 北京: 中国现代史料编刊社, 1980.
- [4] 杨奎松. “鬼子”来了: 现代中国之惑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135.
- [5]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 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 [6] 达林. 中国回忆录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 [7] 孙中山. 孙中山文集: 上 [M]. 孟庆鹏, 编. 北京: 团结出版社, 1997.
- [8] 包惠僧. 包惠僧回忆录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3: 137.

^①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三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第503页。

[9] 邓中夏. 邓中夏文集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43.

[10] 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 [M] //毛泽东选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71.

From Independence to Unity: The Strategic Change of the CPC in 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KMT and the CPC in the Early Stage

Liu Dayu, Zhang Xinyu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it adhered to the stand of an independent political part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tuation and the change of cognition, and influenced by the change of the attitude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the Kuomintang (KMT), by 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KMT in 1924, all the members of the CPC had joined the KMT as individuals, realizing the first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KMT and the CPC.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KMT and the CPC was not the CPC's overall acceptance of the instruction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but under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fter many internal discussions and multi-party consultations, the CPC gradually realized the necessity of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KMT and the CPC, and its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experienced a gradual process. The strategic change of the CPC's early handl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KMT and the CPC reflects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early leaders' self-cognition in practice, the independent judgment made to achieve the revolutionary goal, and the initial embodiment of the ideological practice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which has mad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promoting the arrival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Key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KMT and the CPC; the Kuomintang

(收稿日期：2021-01-08；责任编辑：晏小敏)